第一章　中共党史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

一、研究对象、内容

中共党史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中国现代史学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它是中共党史学科的自我反思学科，是中共党史学科体系中的基础理论学科。

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这个“全过程”，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一切方面。其具体内容是：

1. 史家，即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

所谓史家，就和政治家、思想家不同。有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如著作等，就可以称之为中共党史学家，是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反之，就不是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有些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没有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就不是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有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有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如蔡和森、瞿秋白、张闻天等，那么他们可以成为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所谓史家，就和文学家不同。文学家及其作品是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史学史研究的对象。一些反映中国共产党斗争历史的文学作品及其作者，不是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史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不是其他史家，不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史家，不是世界史研究的史家。至于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史家，其成果与中共党史有密切关系，可以成为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可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也可以研究一个阶段的历史；可以研究某一事件，也可以研究某一人物，某一项工作。只要从事中共党史范围内的研究，有成就的学者，就可以成为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共党史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的一门热门学科。中国国内有不少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世界各国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无论是国内的或者国外的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无论持有何种立场观点的这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是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2. 史著，即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

史著与政治理论著作不同，政治理论著作不是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史著与文学作品不同，文学作品不是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史著一般应是史学著作，即党史研究的著作，而不应是资料书、资料集、文献集。资料书是史料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史学著作与史学论文也有区别，史学著作包含的质与量，与史学论文包含的质与量，是不同的。史学史一般以史学著作为研究对象，而不以史学论文为研究对象。只有那些特别有影响的论文，史学史可以进行附带的研究，可以将史学著作与史学论文进行比较研究。

党史著作日益增多,且种类多,形式多,中国大陆很多,香港、台湾地区也很多,国外也很多,这些著作不论立场、观点如何,都可以研究。优秀的、进步的党史著作可以研究，落后的、反动的党史著作也可以研究，可以把不同的党史著作作比较研究，研究其中的斗争，探讨发展规律。在大量的党史著作中，一般选择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意义的著作进行研究。

3. 史学团体、机构、流派，即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团体、机构、流派

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各省市的党史研究室，是党史研究机构；如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抗日战争史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等是党史研究的团体；如中共党史研究中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派别、流派，这些都是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对团体、机构、流派的研究，是对史家群体的研究，也是对党史研究组织工作的一种研究，党史研究组织工作也可以成为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4. 史学思潮，即中共党史研究的某些思潮

如‘文革’时期个人崇拜思潮影响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如改革开放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等，都是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5. 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即中共党史研究中运用的思想、理论、方

研究史家、史著，研究史学团体、机构、流派、史学思潮，怎么研究呢？首先就是研究他们的思想、理论、方法，思想、理论、方法是史学研究的灵魂，是史学研究成败的根本所在，是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的结晶，只有首先把这些研究清楚，才能对史家、史著等作出深刻、准确的评价，才能对中共党史研究有导向作用，有指导意义。

二、研究目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目的、任务主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发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探讨其中的发展规律和方向，以指导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同时，也为建设一个科学的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而努力。

三、研究作用、意义

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作用、意义与中共党史学概论研究的作用、意义有某些相同之处。如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全面建设指明正确的努力方向，总结中共党史研究的经验教训，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检阅新成果、新领域，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发展、新突破，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人才培养等，中共党史学概论有这些作用、意义，中共党史史学史也有这些作用、意义，可以相互参见。总之，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可以促使中共党史研究的研究者、工作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发展规律，明确前进方向，少走弯路，提高研究水平，取得更多且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可以推动中共党史理论研究、资料研究的发展，推动研究方法的发展，对中共党史研究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四、学科性质、特点

中共党史史学史是史学史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史学史如果视为一级学科，那么中国史学史是二级学科，中共党史史学史是三级学科。中共党史史学史属于历史学科是无疑的。

中共党史史学史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具体历史问题，而是研究中共党

史研究的历史，总结中共党史研究的经验教训，探讨其发展规律，它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专业基础理论学科。如果中共党史学概论是中共党史学科体系中第一位重要的学科，那么中共党史史学史是仅次于中共党史学概论的中共党史学科体系中第二位重要的学科。

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政治性、现实性、科学性等特点，这与中共党史学概论学科的特点是相同的，可以相互参见。从总结经验教训来看，中共党史史学史与中共党史学概论的角度也有相同之处，这使中共党史史学史与中共党史学概论也一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不同的是，中共党史学概论基本是宏观的理论研究，而中共党史史学史既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研究，也从事党史学家、党史著作的某些微观研究，这种微观研究的性质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微观研究基本相同，只是研究的内容不同。中共党史史学史是理论研究与史实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学科。

五、学科体系

中共党史史学史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两大部分。历史研究部分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段。

第一部分理论研究，主要研究、论述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内容、目的、任务、作用、意义，学科的性质、特点，中共党史史学史的历史分期，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这一部分可以作为导论。

第二部分历史研究可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发展，下编论述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两大时期中可以分若干历史阶段，以历史阶段为章，研究各阶段中有代表性的党史学家、党史著作。

作为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著作，书末可编制一些附录，如中共党史研究主要书目、中共党史研究大事记等。

六 、 分 期

中共党史研究自 1921 年产生以来,至今已有 80 年的历史。这 80 年

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1949.9)

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初创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野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镇压，又处在战争环境，以及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中共党史研究处于半公开和地下状态，中共党内研究中共党史的人数不多，研究的规模也不大，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著作往往不能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这一时期中共党内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大多为中共党内的领导人。研究中共党史大多密切配合政治斗争，政治色彩浓厚。资料无法全面搜集、整理，很多理论问题尚无暇探讨，尚未完全走上学术研究的轨道。

2.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 (1949.10—1978.12)

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曲折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走了曲折的道路，政治上的曲折道路给予学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以极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1966年5月至1978年12月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从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中共党史研究、教学队伍迅速发展。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开始探讨，中共党史研究的资料建设逐渐展开，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特别是讲义大量出版，论文大量发表。这一阶段的中共党史研究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但政治色彩、宣传色彩仍然较浓厚，学术研究的色彩较淡薄。特别是5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经济生活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这使学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也受到一些“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尚未成熟。1966年5月至1978年12月，是“文革”及受“文革”影响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遭受极大破坏，学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也受到极大破坏，中共党史研究一度成为林彪、“四人帮”为“文革”服务的工具。以至出现伪造党史的现象。讲真话受排挤、打击，讲假话成风。毛泽东史、路线斗争史、大批判史代替了中共党史。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初两年，毛泽东史、路线斗争史、大批判史仍是中共党史主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2—　　）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科学化，走向成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端正了思想路线，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政治健康向上，学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很快拨乱反正，清除“文革”邪风恶习，健康发展。“文革”时期停顿的中共党史研究的资料建设重新规模化发展。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发展起来，国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投入日益增加。这些都推动了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空前繁荣。以往研究中不敢碰的“禁区”一个一个被突破，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开始重新探讨，中共党史学科组成体系中的诸学科建设逐个上马，一大批有分量的、学术价值高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陆续问世。中国的中共党中研究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发展

（1921　1949.9）

一　、　概　说

1921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中，谈到了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6月，瞿秋白《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更深入地论及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论述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这些都是最早的中共党史研究文字，表明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共党史研究在1921年已经萌芽。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党。此后，由于汇报、交流，教育党员、干部的需要，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需要，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文字日益增多，并且有一些篇幅不大的专著（小册子）、专论问世。如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可以视为无产阶级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早的著作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可以视为无产阶级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早的专史 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亦是极有价值的中共党史研究的论文。30年代的论著有：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1月至2月）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6—1938），以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华岗、张闻天的著作篇幅已比较大，资料工作、理论研究也有一定水平，对以后中共党史研究有较大影响。

40年代，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回顾、总结党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干部、党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很多高级领导人写出了党史论著、党史回忆录。如周恩来写出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等等，刘少奇有《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等，王若飞有《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等，陆定一有《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等，毛泽东也有《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动全

党回顾总结党史、研究党史，毛泽东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1942年3月30日），这成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篇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专论，在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和地位。这篇专论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其贡献是：

（一）阐明了党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专论开头就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把党的路线政策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①]以史为鉴，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任务。毛泽东强调了党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而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政策，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今天的路线政策，同时有利于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项实际工作。毛泽东关于党史研究目的、意义的阐述，已比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李立三《党史报告》中的论述更深刻、更具体。这样的阐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二）论述了党史研究的对象。专论谈到："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就是说要把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不只是研究哪一步、哪一个阶段、哪一件事。研究党史就是要对党的全部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系统地去考虑"。此外，毛泽东把研究路线和政策放到了党史研究的重要地位，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政治任务所决定的。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中共高级干部、各级干部研究党史首先就是要解决政

①《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引文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99～40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治路线、政策的是非问题，以及和政治路线关系密切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问题,一些细小的事情“ 个别细节 ”则不必研究。专论还谈到 要用科学的方法 “ 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这里提到的要研究的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显然都是和路线、政策密切联系的重大问题。在论述党史研究对象时，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了要系统地研究党的全部历史，另一方面又把研究的重点对象放在路线政策上，这反映了当时党内对党史研究对象的认识水平，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可以看到，当时的党史研究是一场政治运动，是一场解决党内历史上政治路线是非的大斗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甚至有火药味，而不是中共党史的学术研究。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要求来看 ,党史研究的对象应当包括党的组织发展史 ,党领导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等等，而研究党的组织发展史等在当时不是当务之急，自然就没有强调的必要了。史学研究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党史研究更是如此。从毛泽东对党史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对象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毛泽东对党史研究对象的论述，在今天看来尚有不足之处，但在当时能把 “ 党史研究对象 ” 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这是党史研究中理论问题研究的进步，蔡和森、李立三等人还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的研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党史研究对象的论述，对于 40年代及以后的党史研究是有很大影响的。

（三)指出了党史研究的立场。专论说“: 研究中国党史 ,应该以中国做中心 ,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我们也必须研究 ,但是要和研究中国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那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国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 ,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 ,而去搬外国的东西 ,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 这里谈的是立场问题，指出了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而不能站在外国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不要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研究历史，往往决定了对历史的某些认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同一事件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解说。可以想像，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

史，和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会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和论述。如果只按照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来研究中共党史，以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句句是真理，而不考虑中国革命实践检验的结果如何，那么甚至会把中共党史上的一些政治路线是非搞混淆了。“搬外国的东西”，“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实际上也是强调了要站在中共党内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路线的立场上，站在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立场上。这个立场问题的强调，显然也是当时政治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因为当时研究党史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彻底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要彻底清算王明路线就非站在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立场上不可。立场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毛泽东强调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正是政治斗争的反映。立场问题，本来首先是阶级立场的问题，然后才是路线立场，因为当时延安解放区中共党内研究党史，阶级立场不是首要的、突出的，而路线立场是首要的、突出的，所以毛泽东没有强调阶级立场，而强调了路线立场。毛泽东讲以中国做中心还是以外国做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国家立场问题，实质是路线立场问题。毛泽东关于党史研究立场问题的论述，其意义也是深远的。

（四）分析了党史研究的观点。专论谈到：“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这里分析、强调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要用科学的观点，不要用主观主义，来研究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毛泽东强调了历史不是少数人创造的，研究历史事件要研究它的客观原因，它的实质。既要研究历史现象的真相，更要研究历史本质的真相。毛泽东已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注意到了领袖作用的问题，既指出历史不是少数人创造的，又指出了“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毛泽东还注意到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专论谈到陈独秀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

讲一讲他的功劳。”陈独秀虽然组织“托派”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对抗，但毛泽东还是肯定了他做出过的功绩，认为写党史应该写出陈独秀的功劳。这进一步表明毛泽东强调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党史，这是惟一科学的观点。这在当时与毛泽东领导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党史、开展整风运动是一致的。毛泽东在专论中强调的党史研究的观点，仍然是我们今天党史研究中应该遵循的。

（五）总结了党史研究的方法。专论说：“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党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里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对以往党史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总结，首先强调研究党史必须用马列主义的方法、马列经典作家教导的方法，其次论述了两个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一是全面的历史方法，二是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全面的历史方法，简单说就是历史分析方法，就是对历史问题进行历史的全面研究，给予历史的客观评价。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要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过程中去研究，而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过程，即不能用后来的历史条件、后来的人们的认识来研究以前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既要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历史的分析研究，也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即进行一分为二的研究，而不要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具体地来说，就是要全面地占有资料，进行历史的辩证法的分析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毛泽东说的“古今中外法”，有历史方法的内容，而主要的是指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即中、外的对比研究。毛泽东讲的“中”、“外”，不只是指中国和外国，实际上是指“己方和彼方”。专论中谈到：“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今’,还有一个‘中外’。”为了有利于“中外”的比较研究,毛泽东还提出:“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党史,将来需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详尽,“中外”研究就是对比研究。研究中共党史,只研究中共党内的材料还不行,还要研究国民党的,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材料才行;把两方面的材料对照起来研究,才能全面,也才能科学。资料全面是研究全面、科学的基础。在谈到抗战时,专论说:“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这里的比较研究又深入一层,即不仅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研究,就是国民党内部国民党的文件也要比较研究。真正做到了各个侧面、各个层次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的研究就能全面、科学了。历史比较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常用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已被视为是间接的实验方法。历史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进行实验研究,但进行两方面、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就可以达到全面研究的层次,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所以比较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组成部分。这种方法是当今史学界重视、盛行的方法,毛泽东在40年代便于党史研究中大力倡导,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对党史研究方法深入具体的总结、论述,使无产阶级的党史研究方法,在理论上有了大的发展。蔡和森等人已经注意到了历史分析方法,但还没有注意到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尽管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蔡和森已经进行了一些历史比较研究,但对历史比较研究还没有理性的认识,还没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而毛泽东不仅深入论述了历史分析方法的具体内容,而且深入论述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具体内容,这自然是对党史研究方法的一大推进和贡献,至今仍有巨大现实意义。

(六)探讨了中共党史分期。中共党史的分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专论将中共党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大革命准备阶段(1911—1924)、大革命时期(1925—1927)、内战时期(1928—1937)、抗日时期(1937—1945)。接着从革命任务、

革命手段等方面分析了大革命、内战、抗日三个阶段的特点。指出：从革命任务看，“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阶段的直接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从革命手段和群众的联合看，第一阶段是联合全国各民主阶级，实行国共合作；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阶段是恢复国共合作形式，全民族抗日。从党的路线看，第一阶段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阶段是狭小的统一战线；第三阶段又是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是合乎事实，都说得通”。专论又提到大革命准备阶段：“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这样看来，毛泽东说的大革命准备阶段，内涵是 1921 年至 1924 年，外延则包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所以大革命的准备可以是 1911 年至 1924 年。毛泽东的这个分期及其命名，有独到之处，特别是把 1911 年至 1924 年作为大革命的准备时期，是有创见的。这种分期的明显特点，就是从中国革命史的发展来分期，而不是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来分期。从中国革命的发展来看，大革命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而把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前的一段作为大革命的准备阶段，也是合乎事理的。这样的分期和命名不愧是一种卓识。毛泽东强调了研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性，即强调了要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背景来研究，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也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强调了这一点，也不愧是一种卓识。毛泽东的党史分期，比起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分期来，概括得多，理论色彩浓厚得多。毛泽东的党史分期，贡献最大的是在大革命准备时期，这一时期的概括是高度的复杂的概括，而后三个时期的概括是简单的概括，而且“大革命时期”的命名蔡和森等人已经注意到了。毛泽东把中共党史研究的上限推到辛亥革命，这个观点以后被一些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者所采纳。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分期法，以后也被很多的党史、革命史研究者所采纳，可见毛泽东分期说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了。

毛泽东谈自己的分期说时又讲：“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的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申明了他的分期说是一家之说，不是定论，是可以讨论的。这反映了毛泽东的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以及对党史研究的民主作风、平等地位、严谨态度。也说明毛泽东很重视党史分期这个理论问题，希望更多的人来关心、研究这个问题。以后，“大革命准备时期”的说法，有些党史研究者就没有采用，而用建党时期等说法。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背景追溯到辛亥革命的观点，有些党史研究者也没有完全接受，一般还是把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追溯到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国情，从而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展。尽管如此，把党史分期作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这是毛泽东对党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而且毛泽东党史分期说的提出，也是中共党史宏观研究的一大进步，是党史研究中分期问题的一个突破。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共党史研究有了比较系统的理性认识，开始把中共党史研究提高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来了，并且为把中共党史研究导向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科学方向，作出了重要贡献。

整风运动中回顾党史、总结党史、总结经验教训的集大成成果是 1945 年 4 月 20 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党史的经典之作，在中共党史

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

《决议》的成就和意义首先是在政治思想上：

（一）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①“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决议》最后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肯定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思想，这在当时是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因为当时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全中国人民需要确立一位人民领袖，需要形成新的凝聚力中心，需要有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支柱因此《决议》在这方面的努力必须充分肯定，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二）全面清算了党内的错误路线，澄清了党内历史是非。《决议》指出，大革命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这是错误路线，并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决议》指出，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4 月，党内出现了第一次“左”倾路线“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使“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这是错误路线《决议》指出：“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于‘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而且“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

①《决议》引文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952～999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也是错误路线。《决议》特别指出了‘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指出陈绍禹《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等方面的极大危害,其在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直到遵义会议才得到纠正。此外还指出了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张国焘的分裂党、叛党行为是‘反革命行为”。并且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这使得建党以来至抗战时期以前的党内的路线是非、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得到全面的澄清，从而使全党对历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统一的认识，更有利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周围。

（三）深刻总结了 20 多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决议》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危害最大的王明路线给革命造成损失的教训都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决议》不仅总结了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方面的经验教训,更注意了总结思想路线方面的经验教训。《决议》指出“: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决议》指出王明路线‘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它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决议》又指出“: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

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9] 经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决议》号召全党：“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决议》能从思想路线上总结历史教训，强调了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务必把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这使经验教训的总结有了深度。在此以前的党史研究中，尽管都在总结经验教训，但是，都往往没有能深入到思想路线方面来总结。蔡和森在党史的研究中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但还没有提高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经验主义的理论高度来认识，也没有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一比较，可见《决议》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深刻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高多了。《决议》在分析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时，不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政治错误上、一般的思想方法上，而且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高度来分析，指出他们都是把“片面的相对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真理”。这也表明了《决议》在总结思想路线的教训时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可以说《决议》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已经反映了经过整风运动，经过理论学习，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已经空前提高了。正因为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空前提高，所以对历史上错误路线带来的教训的总结也就极为深刻。《决议》对思想路线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意义极其重大,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水平，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有重大的作用。

《决议》是政治决议，也是党的历史决议，它在党史研究上也卓有成就。《决议》在党史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了历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